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 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

肖玉秋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 1715 年首届传教士团来华到 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第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并不重视东正教经籍的翻译，只有个别成员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第二时期从 1858 年到 1900 年。传教士团配合《中俄天津条约》中有关允许俄国人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对传教士团职能的调整，着手翻译经书，为大规模传教进行准备。1900 年到 1917 年为第三时期。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遭受重创之后，1902 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发展东正教势力，经书翻译和刊印达到高潮。

关键词：俄国 传教士团 东正教 经书汉译与刊印

作者肖玉秋，1963 年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印是俄国传教士团在华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往我国学术界对该问题少有论及。大量文献说明，俄国传教士团在传教布道的同时，曾经在华翻译并刊印了许多东正教经书。与俄国传教士团的传教活动相适应，其经书翻译和刊印活动也经历了《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从《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到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三个时期。本文拟对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在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经书翻译和刊印的背景、内容及特点做一简单梳理。

一、《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

自 1715 年首届传教士团到 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俄国一共向中国派出 13 届传教士团，包括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修士辅祭和教堂差役在内的神职人员达 81 人次。这是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上最长、派遣神职人员最多的一个时期。维持雅克萨战役及后代的东正教信仰，是历届传教士团主要的任务之一。为此，传教士团采取了包括学习汉语、物质诱惑和开办学校等措施，但并没有像西方传教士那样着手翻译宗教书籍。第 14 届和第 15 届修士司祭伊萨亚在其编撰的《俄汉宗教术语词典》前言中写道：“我们不知道，在将经书翻译成汉语方面，俄国传教士在 18 世纪做了什么工作。尽管

难以想象,像尤马托夫^①这样在当时看来非常有学识的人,竟然没有为信赖他的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但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从那个时期流传下来。”^②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1715年来京以后,传教士团所面对的宗教服务对象仅仅是雅克萨战俘及后代,这些人在头几十年时间里尚可以操俄语交流,因而对汉译宗教书籍的需求并不迫切。其次,清朝从雍正二年开始禁教,俄国政府为确保其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利益,有意避免因为传教而引起清政府不悦。尽管俄国圣务院希望在中国居民中发展教徒,但由于传教士团一直没有得到充足的物质和资金支持,很难付诸实施。第三,前几届神职人员教育水平很低,不具备翻译宗教书籍的能力。第四,在俄国人到来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已经翻译和刊印了许多基督教书籍,俄国传教士可以直接利用。第4届传教士团就曾利用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于1636年译为汉语的《圣经直解》(1739年重刊)给自己的教民讲解圣经。第五,俄国政府一度认为即使不翻译经书,也不会影响传教布道的效果,“因为蒙古人就是听用藏语诵读经文,结果却非常信奉他们的佛祖”。^③

最早将东正教书籍译成中华语言的是第8届传教士团学生利波夫措夫,他在1794年至1808年间就完成了《新约》的满文翻译。但是,利波夫措夫的满文译本没有得到俄国圣务院的批准,被英国圣经公会拿去出版。天主教传教士在其东北的教会学校中使用利波夫措夫的译本做神学教材,并用它来在满人中传教布道。第9届传教士团领班比丘林认为必须“逐渐将当地语言应用于祈祷,这对教化那些真正有意皈依基督教的阿尔巴津人来说很有必要”。^④他改编意大利耶稣会士潘国光的《天神会课》一书,于1810年刊印。^⑤此事在费赖之著作中也有记载:“俄国驻北京传道会长比丘林曾采此本文,刻于北京,以供希腊宗之用。”^⑥但比丘林所依据的1739年的“皇城西安门内首善堂藏版”在费赖之的目录中没有辑录。俄国圣务院对比丘林的做法给予赞许和支持,同时也提醒他在利用耶稣会士著作时“删除与东正教教义不符的内容”。他在改编《天神会课》过程中发明的个别宗教术语译法沿用至今,不仅为东正教所接受,而且也被天

^① 第5届传教士团领班。据第5届传教士团教堂差役齐明于1773年6月7日写给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尤马托夫在17年(1755—1771)任期为220名满人和汉人施洗。如果这一记录准确的话,那么尤马托夫的传教业绩超过了18世纪的历届传教士团领班。——笔者注

^② 转引自 Шубина С.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Ярославль. 1998. С.131.

^③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Богослужебные книг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Христианское чтение. 1885. Ч.2. С.498.

^④ 转引自 Шубина С.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в.). С.131.

^⑤ 比丘林在该刻本上的署名为“乙阿钦特敬刻”,“乙阿钦特”为比丘林法号 Иакинф 译音,今译“亚金甫”。参见: Hartmut Walravens. Zur Publikationstätigkeit der Russischen Geistlichen Mission in Peking,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XXXIV (1979—1980). S. 525—557.

^⑥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230页。

主教传教士所采用。对于 Ecclesia 一词，潘国光采用了音译的方式，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而比丘林将其改译为“教会”，较好地体现出该词“蒙召出来的会众”的希腊文本义，可以说，汉语中“教会”一词乃是比丘林的创造。《天神会课》一共刊印了400册，现在发现有三分之一（129册）在俄罗斯，其中一册上还有俄文“被中国政府禁止和查抄”的字样。陈伦绪所著《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中记载北京耶稣会图书馆收藏的比版《天神会课》上也有用法文所作的同样说明^①。清政府自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禁教政策以及对俄国在京人员宗教活动的警惕。关于这一段历史，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记载：“国学内有俄罗斯学。康熙间，许俄罗斯通中国，始遣其子弟入学，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于其国，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嘉庆己巳忽寄书一本，皆汉字。其书卷前二页有圆图如太极状，图内黑白杂错，若画云气者。其解以为阴阳二气，有此二气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为配，是生天主，反复辩论，大意似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书奏，仁宗令察其书所自来，得其刻板毁之。案俄罗斯，古丁零国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国教宗耶苏。”嘉庆己巳，乃公历1810年，正是《天神会课》问世之年。而且此版《天神会课》共28页，其中确有7幅插图。因此可以断定，清朝理藩院所毁之版，就是比丘林《天神会课》之版。比丘林在华时间是1808年至1821年。这说明比丘林的印经传教计划一开始就夭折了。比丘林后来荒废教务，潜心学问，恐怕与此事有很大关系。而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大都认为是由比丘林散漫自由的个人品行所致。

在西方传教士翻译或编写的基督教神学著作中，潘国光的《天神会课》受到俄国传教士的格外关注。浅显的语言和简单的问答形式使其成为比较实用的教义入门读本。列昂季耶夫曾将其14章中的9章译成了俄文，以《天神课》为书名于1781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几十年后，比丘林改编了潘国光的《天神会课》。俄国圣务院对比版《天神会课》很感兴趣，曾致函俄外交委员会请利波夫措夫译成了俄文。显然，圣务院当时并不清楚比版《天神会课》与列版《天神课》都是出自潘国光的《天神会课》。

第10届领班卡缅斯基注重神学图书的搜集和抄写。他从北京耶稣会士的藏书抄写《圣经》汉语版和满语版各两份，将其中一份呈送圣务院，并把一整箱汉语版《旧约》运回俄国。卡缅斯基将法国尼古拉·马勒伯朗士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基督徒与异教徒的辩论》翻译成了满语和俄语，作为对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的补充。1825年他还根据《创世纪》编写出《圣史纪略》。第10届修士司祭西维洛夫在译介经书方面多有尝试。他翻译了罗斯托夫都主教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东教宗鉴》以及早堂和晚堂经本，与其中国老师车奇（俄文 Чэци 译音）用半文言语体译出了《玛特斐乙福音经》和《宗徒行寔》。1831年西维洛夫翻译了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的《简明教理问答》，同时附录了圣根纳季论述信仰的100句箴言，1840年又对译文进行了修订。同时，他从巴西尔、约安·兹拉托乌斯特和格里高里·德沃耶斯洛夫所编写的领圣体祈祷

^① Карезина 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атехизис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Иакинфа(Бичурина). Дипломная работа. 2004. С.25, 19.

经中翻译了祈祷文,汉译本名为《圣体血礼仪提要》。第11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基谢列夫斯基的汉译作品有《教理问答提要》、《正教本分》以及两种布道稿。

由此可见,俄国传教士团翻译经书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主要动因是为了满足教堂举行圣礼的需求。雅克萨战俘到京已近百年,俄语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如再不使用中华语言,无论是对雅克萨人进行教义训导,还是举行各种教堂仪式,都将困难。一直到《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传教士团的经书翻译和改编活动的目的多是为了维持雅克萨战俘后裔的东正教信仰,好在返国后向圣务院复命。所以,传教士团成员尝试将一些圣经内容以及教理问答和祷祝词之类的书籍译成汉语或对其汉语本进行改编。利波夫措夫将《新约》翻译成满文,说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雅克萨战俘后裔作为镶黄旗俄罗斯佐领成员,在与满人一起生活和通婚的过程中,尚有人可以听懂满语。但是,这个时期的翻译和改编活动多为传教士团成员的自愿行为,并非俄国政府及圣务院规定必须完成的任务,更谈不上得到政府及圣务院物质或资金上的支持。在清朝的禁教政策之下,俄国传教士在从事这类活动时还承担着一一定的风险。比丘林《天神会课》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俄国传教士团在中国传教条件或背景的写照。所以后来卡缅斯基、西维洛夫和基谢列夫斯基所翻译的神学著作,只有手稿存世,而没有刻板刊印。

二、从《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到义和团运动爆发

1858年俄国胁迫中国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俄国圣务院称“条约为传教士团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传教士团的活动应该转到在中国人中间传教上来”。^①1861年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设立俄国公使馆以后,传教士团原有的外交职能被取消,转而专门从事传教活动。从此,俄国人得以走出俄罗斯馆,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传教。然而,从1858年的第14届到1902年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俄国仅派遣神职人员30人次,有限的几个神父根本无法满足逐渐增多的在华俄人的宗教需求,像天津和福州这样俄国商人集中并设有领事机构的城市,数年才能往那里派遣一次神品,更不能适应在中国人中间传教的新形势。而且俄国政府要求“传教士团必须在初期的行动中格外小心谨慎,尽心竭力地利用各种机会为教会争取新的教民……但这一切必须悄无声息地进行,尽量采取平和的做法……不要引起当地政府的怀疑和不满并因此而为自己未来的行动设置障碍。”^②这反映了俄国一方面希望利用允许外国人自由在华传教的有利形势迅速扩大在华的东正教势力,同时也不愿因传教而影响其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东正教士的中国本土化进程开始,在用汉语传教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结果传教士团并未进行大规模传教,比如第14届任内

^① Коростовец И. Китайцы и 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я. 2-е изд. СПб.: 1898. С.405.

^② 转引自 Шубина С.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100-101.

(1858—1864)发展教徒约为200人,1896年第18届抵京时教徒人数约有500人,相反,传教士团却把很大的精力用于翻译东正教神学书籍,为大规模传教做准备。与此同时,伊萨亚曾尝试用汉语主持圣事,但因为没有一本翻译准确而流畅的讲道稿,终未能取得成功,不得不继续使用斯拉夫语。这种状况也促使传教士团将翻译经书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伊萨亚还筹备建立刻板、装订和印刷等作坊,使传教士团具备了印刷汉字书刊的能力。可以说,经书的翻译和刊印构成了这一时期传教士团最突出的业绩。到1900年以前,传教士团翻译刊印的东正教书籍主要有三大类,分述如下:^①

第一是圣经类。俄国传教士团一共刊印了三个《新约》汉译本。第一个进行《新约》汉译的是固礼^②,译本刊印于1864年,名曰《新遗诏圣经》(吾主伊伊稣斯合利尔斯托斯新遗诏圣经谨遵原文译汉敬镌板,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岁次甲子夏季),1865年重刊,而后第16届传教士团领班法刺韦昂进行了改编,刊印于1884年,名曰《福音经集解》,第18届领班英诺肯提乙1911年刊印了第三个译本,分册刊印,包括《玛特斐乙圣福音经》、《玛尔克圣福音经》等。前两个都是文言本,后一个是白话本。固礼在担任第14届传教士团领班之后即开始翻译《新约》。当时曾经有人怀疑固礼在翻译过程中利用了一个匿名的英国女人的圣经译本,对此固礼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只有上帝曾经帮助过我。中国的隆举人^③只是帮助我抄写。一般来说,我是手捧《新约》在房间里踱步,口述经文,而隆举人坐在桌前记录下我的翻译。”^④固礼用俄语称隆源为“汉文学硕士”,并在《新遗诏圣经》自序中表示了对他的感激之情:“此书幸赖须天举人隆源参订,神子玛[利尔]亚,尼假[伊克]他、摩伊些乙校阅,共襄助成功。”19世纪末,俄国著名蒙古学家波兹涅耶夫认为固礼的《新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马礼逊于1813年完成的《新约》汉译本的抄本,波兹涅耶夫只是对其中的专有名词读音和几处译文做了修改。^⑤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继续研究。据载固礼的翻译工作前后历时6年,初稿完成后,由传教士团女子学校的老师玛利尔亚和她的儿子尼伊克他以及雅克萨战俘后裔摩伊些乙进行诵读。尼伊克他等在《新遗诏圣经》全序中做了如此描述:“无如吾大神父,二次驻京,六载瓜期瞬至,欲以所译者尽福梓传世而已,力无暇周章,脱

^① 参见 Алексей (Виноград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 ученые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в г. Пекине или Бэй-Цзине (в Китае)*. СПб.: 1889. С.23-33.

^② 在传教士团所刊经书封面及扉页上,固礼的名字还被写成固喇乙、固[利尔]乙。此处依照清代文献中之常用形式。

^③ 根据已刊经书上的署名判断,此人叫隆源,清代举人,长白山人氏,号云溪。1880年隆源刊印由其编写的《圣教六戒》。同时他还撰有3篇讲述东正教教义的文章。——笔者注

^④ 转引自 Иванов П.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1998. № 3.

^⑤ 阿·马·波兹涅耶夫著,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卷前言第22页。

稿后乃命神子等三人拨冗校阅语文之讹舛已三载於。”关于刻印《新约》的经过，固礼写道：“需要为抄写者准备稿本。抄完之后我要检查。由另一位画匠按照印刷要求抄写成棱角分明的方块字。然后再进行新的检查，核对是否有遗漏，所有的笔画和标点是否完整，换行是否正确。刻板人将一页稿子拿走，放在木板上雕刻。但在这项工作中也会出错。因为稿子都是反面向上放置，字也是反着的。……每天都有新的麻烦出现。”^①

固礼的《新遗诏圣经》包括福音经 4 册、宗徒经 22 册和《默示录》。福音经包括《玛特斐》、《玛尔克》、《鲁喀》、和《伊望》。宗徒经包括《宗徒行实》、《公书七札》（亚适乌、撒特尔前、撒特尔后、伊望一、伊望二、伊望三、伊屋达）、《私书十四札》（罗[马尔]书、适[凌尔]福前、适[凌尔]福后、夏拉提亚、耶斐斯、肥利批、适罗斯、莎伦前、莎伦后、提摩斐前、提摩斐后、提特书、肥利孟、耶乌[雷尔]）。从中可以看出，为了显示东正教的特色，固礼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与天主教圣经译本不同的译名。

固礼在翻译之前和翻译过程中没有向圣务院做过汇报，直到付诸印刷时才向国内提出申请并于 1866 年获得许可。而此时的固礼已任满回国了，其译本也早已于 1864 年和 1865 年在北京问世。第 11 届传教士团实际领班安文公和西维洛夫都发表了评论。安文公称固礼译本比他在上海见到的麦都思译本还好，而西维洛夫则对固礼翻译的每一部经书都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论。^②实际上，由于固礼采用的是文言文，且没有编写专门的注释性词表，难以为普通民众理解，其译本远不如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受欢迎。

为了帮助信徒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翻译的《新遗诏圣经》，固礼于 1865 年翻译了希果泽尔斯基的《圣经导论》。他在翻译时特意对译文做了某些改变，使之变成了问答形式，然后以《圣经析义》为书名分 4 本刊印。固礼还编写了《新遗诏圣史纪畧》，分首、中、末三篇于 1861 年刊印。卷首有《总目录》，从中可以看到从基督降生到复活期间发生的所有大事。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实迹录传》。另外，固礼还在 1863 年刊印了一本旧约圣史，书名为《圣上史提要》。

法刺韦昂在阅读固礼的 4 部福音书译本时，发现了许多难以理解之处，于是决定对译文进行必要的注释和导读后再行刊印。他在经文的下面用更小的字体印刷了由他编写的讲经内容。从法刺韦昂开始，“编写夹行注的方法在以后得以延续。译者们难以传达某些神学概念（尤其是圣三一、基督化身等基本教义）时便做出说明。”法刺韦昂编写的讲经部分虽然也掺杂了自己的思考，但更多的是参考了俄国的同类书籍。据第 16 届和第 17 届传教士团修士司祭尼阔赖称，法刺韦昂在注释过程中参考过施约瑟的译本。

^① 转引自 Иванов П.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ереводы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 1998. № 3.

^② Хохлов А.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и китай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книг. Ки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8-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6.

但此说未必可信，因为在法刺韦昂改编固礼译本之前，施约瑟只翻译过《旧约》（1874年刊行），著名的《二指版》直到1902年才问世。法刺韦昂的《福音经集解》，在某些名词的翻译上，与固礼有所差别。比如，固本中的“福载”在法本中变成了“真乐”，而“神贫者”被改译成了“心谦者”。^①

伊萨亚将米哈伊尔·博戈斯洛夫斯基的《新约圣史》以及菲拉列特的《新约与旧约圣史》翻译成白话，以《圣史记畧》为书名先后于1867年和1879年刊印。《圣咏经》的最初汉译本出自第15届领班巴拉第笔下，为文言本。后来，为适应在北京的传教需求，伊萨亚对其进行简化，法刺韦昂进行文字加工，于1879年在北京刊印。

俄国传教士团翻译刊印的第二类宗教书籍为神品学校用书或对中国东正教徒进行精神道德说教的手册。翻译和刊印次数最多的应该是由菲拉列特编写的《简明教理问答》和《详述教理问答》。继西维洛夫和基谢列夫斯基翻译《简明教理问答》之后，固礼的译本于1865年刊印，名曰《教理问答》。而后伊萨亚再次将《简明教理问答》翻译成汉语，于1866年和1879年以《圣教会要课》为书名刻印。至于《详述教理问答》，第一个进行翻译的是伊萨亚，他用文言将其译出，后经巴拉第修订，于1871年刊印，书名为《圣教会问答》。

伊萨亚编译了《宗徒行实摘要》，根据巴赫梅吉耶娃的基督教历史著作编写了《两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及一月圣徒行传》，并翻译成汉语刊印。同时，伊萨亚翻译了杰博利斯基大司祭论述东正教节日的著作《世界东正教圣日》，翻译了圣徒伊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行迹，编制了基督降生后一个世纪的大事年表。

固礼翻译的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所撰的《东教宗鉴》于1860年和1863年两次刊印。他还翻译了《圣体规程》（1863年刊印）、《神功四要》（1860年和1864年两次刊印）、《圣号解义》、《诵经节目》（1869年刊印）、《圣史提要》和《早晚课》（1864年刊印）等。

1881年法刺韦昂翻译并刊印了《正教本分》（译自巴热诺夫大神父撰写的《论基督徒职责》）和《圣堂仪物名义志》。次年编写了以训诫笃信上帝为主要内容的《正教畧》，翻译刊印了一部论述天主教与东正教差别的书——《教规畧述》。1883年他翻译了沃洛布耶夫的著作《东正教信仰，或简明基督教神学》。同年，他还翻译并刊印了莫斯科都主教英诺肯提乙·维尼阿明诺夫的著作《天道指南》。

俄国传教士团编写或翻译的青年教导手册主要有《度日文》、《劝上堂文》、《交友文》、《教子文》、《领洗文》、《劝告解文》和《神功四要》等。

俄国传教士团翻译刊印第三类东正教书籍为教堂仪式用书和中国基督徒个人用书。

《正教历》由固礼翻译刊印。上面标注了一年中东正教的所有节日以及圣徒的名字，印上了应该在教堂里咏唱的短小赞美诗。《须用经》由伊萨亚翻译，1865年刊印。

^① И в а н о в П. П р а в о с л а в н ы е п е р е в о д ы Н о в о г о З а в е т а н а к и т а й с к и й я з ы к. К и т а й с к и й б л а г о в е с т н и к. 1999. №1.

《彻夜祈祷后赞美诗集》1866年由伊萨亚译成汉语,但在翻译过程中对某些赞词进行了删节,以后又多次修订。伊萨亚1869年翻译圣安德列·克里茨基的《教规》,巴拉第和伊萨亚于1870年翻译了《新年祷告词及聆听上帝的启示》。《十二节日及大斋节赞美诗集及大斋》由伊萨亚译出,法刺韦昂完善,1880年刊印。1881年,传教士团刊印了《祝文册》,内容包括固礼1864年翻译的早晚经本、领圣餐经和避免褻渎经,法刺韦昂翻译的救世主赞美诗、护卫天使赞美诗和临终祷词,伊萨亚翻译的圣母颂歌,以及法刺韦昂和伊萨亚共同翻译的主日八调和十二庆贺日赞词。同年,传教士团刊印了法刺韦昂翻译的《事奉经》完全本。此前,伊萨亚于1868年也曾翻译过《事奉经》,但不是足本。《圣灵降临节晚祷词》由第16届传教士团神父约安·拉辛斯基译出。《礼拜歌咏规程》1889年刊印。此外,中国籍东正教徒卡西安·林连续几年编制和印刷中国历法与正教历法合璧的日历。

其他教堂用书主要刊印于1884年。《时课经》的译者是伊萨亚。《代亡人祈经》由伊萨亚翻译。十二节日的祷祝词由第16届传教士团的几个成员和中国籍神职人员蜜特啰芳、鄂锡阿和耶乌咩尼^①共同译出。这十二种祷祝词的名称为:《圣母圣诞赞词》、《圣母进堂赞词》、《圣母领报赞词》、《主降生赞词》、《圣母安息赞词》、《主进堂瞻礼赞词》、《主领洗赞词》、《主易圣容赞词》、《圣枝主日瞻礼赞词》、《主升天赞词》、《圣三主日赞词》以及《举荣圣架瞻礼赞词》。另外,《主受难瞻礼赞词》、《主复活瞻礼赞词》和《主日八调赞词》(分为“上经”和“下经”两册)也由中俄神职人员合作译出。

在这一时期,第16届传教士团的经书翻译活动最为积极,领班法刺韦昂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抵京后,即责成隆源、蜜特啰芳等协助整理和校对伊萨亚和固礼的神学书籍译本,再版原有书籍,特别是那些保留有刻版的译作。修士司祭尼阔赖和维诺格拉多夫参与了这些神学译作的校勘。结果在1883年底整理完成了一批手稿,总字数达到30万。从1884年1月起,所有这些文稿经过再次誊清和检查,进入雕版阶段。正文部分为大号字体,行间的注解为小号字。这样,仅这一次就印刷出20多种教堂祈祷用语小册子。1884年,即第17届传教士团来华的头一年,成为这一时期传教士团刊印经书最多的一年。这些书的印刷质量很好,“两种字体非常精美而清晰”。^②传教士团花费了许多资金用来购买木版,仅1884年此项开支就达到2000银卢布。^③与此同时,第16届传教士团也致力于翻译新的经书。有效的组织工作和独特的翻译流程是保障大量翻译经书的重要条件。在第16届传教士团中,经书翻译一般由6人协作完成。首先由尼阔赖和维诺格拉多夫将所要翻译的宗教书籍的斯拉夫文本与希腊原文进行校对,对不明了

^① 此处依据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科学图书馆所藏《主日八调赞词》光绪甲申年(1884年)刻本署名。参见 Яхонтов К. С. *Китайские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книги в Иркутске*. СПб.: 1994. С. 68.

^② Архангелов С. А. *Наши заграничные миссии*. СПб.: 1899. С. 34.

^③ 转引自 Шубина С. 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в.)*. С. 133.

和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修正，译成准确的俄语。接下来由法刺韦昂将俄语意思用汉语口述出来，由蜜特啰芳在领悟了斯拉夫文本的意思后记录成文。鄂锡阿对汉语文本进行审阅，最后由耶乌咩尼检查蜜特啰芳和鄂锡阿是否准确理解了要表达的内容。

实际上，传教士团成员对经书汉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安文公和巴拉第认为根本无法准确地将东正教书籍翻译成汉语。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积极在华翻译经书和扩张势力，他们的观点逐渐得到了改变，认为任何译本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只有尽可能地掌握汉语，才能使翻译更为准确。传教士团的经书翻译经历了一个由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过程。其中固礼和巴拉第的译作多为文言文，法刺韦昂和伊萨亚等则多采用白话文翻译。固礼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文意义的传达。伊萨亚最初希望使用一种介乎于文言和白话的中间语体，没有成功，最后干脆使用了白话。在翻译方法上，俄国人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在中国的天主教士翻译的经验及其作品，同时结合东正教经文的特点，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翻译方法，即为确保原文的准确度而对照希腊原文，为提高译文质量而由中国人进行把关和润色。比如，19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经常用“天主”或“耶稣基督”来表达“上帝”的概念。俄国人从一开始也接受了“天主”这一译法，在东定安村（今北京市通州区麦子店乡东定安村）的教堂匾额上写上了“崇拜天主圣所”的堂名。后来，为了使信徒产生东正教与天主教有所不同的感受，将“上帝（Исус Христос）”翻译为“伊伊稣斯合利尔斯托斯”，使其读起来更加接近古斯拉夫文。^①对于这种翻译取向，一些学院派汉学家提出了批评。1884年的20余册经书刊印之后，东方系汉学教授伊万诺夫斯基在肯定北京传教士团翻译业绩的同时，表达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翻译语言应该尽可能采用文言，原因是中国人是一个尚古的民族。他赞赏英国传教士为适应中国人习惯，按照《三字经》模式编写基督教教义启蒙读物，编写出了自己的《三字经》。他反对过分拘泥于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在个别译名的处理上，他认为“上帝”一词应该采用西方传教士业已发明的“耶稣基督”译法，而不必另造新词，免得拗口难懂，不利于传教，因为“欧洲人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况且这种译法经过长期使用和宣扬已经被中国人广泛使用”。^②

三、义和团运动后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1896年10月，英诺肯提乙被任命为第18届驻北京传教士团领班。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彻底烧毁传教士团的驻地——北馆，并杀死中国籍东正教徒222人。俄国政府一度计划关闭驻北京传教士团，但在《辛丑条约》签订、英诺肯提乙很快恢复北京和天津教务以及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传教中心之后，俄国政府迅速扭转了在传教士团问题上

^① Ломанов А.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 2002. С. 315.

^②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Богослуженные книг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 497.

的立场。结果俄国政府非但没有放弃其经营多年的老巢,而且决定在中国建立主教区,制订《选立辅祭条例》,以方便中国教徒的神职晋升,用汉语主持圣事,扩大在华宗教影响,争取在传教方面也不落后于西方列强。1902年俄国东正教中国主教区建立,英诺肯提乙成为第一任主教。尽管此后传教士团人员构成极不稳定,但在英诺肯提乙处心积虑的经营之下,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中用于赔偿传教士团的18000两白银扩大了传教规模,加快了发展中国教徒的速度。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俄国东正教势力已经扩张到中国的许多省份,直隶地区除北京和东定安村外,还有天津、永平府、通州、西山与涿州等地,河南省有卫辉府、道口、开封府、汲县与宁陵县,湖北省有汉口、袁家口、峯口与仙桃镇,江西省有牯岭和小池口,江苏省有上海和海门,浙江省有台州、杭州、宁波和石浦。此外,新疆和东北的东正教势力发展也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有关。在1917年之前包括雅克萨战俘后裔在内的中国东正教徒总数达到了6310人。

1897年,在天津俄商斯塔尔采夫资助下,传教士团印字房获得了现代化印刷设备,购置了一台价值2000卢布的小型印刷机和近30000个木刻汉字字模,附设了装订房,首次使用活字印刷。^①这同19世纪中叶的木刻印刷相比,无疑是个飞跃。1900年义和团捣毁了北馆的印字房,但1901年印字房又恢复运转。英诺肯提乙专门从谢尔基圣三一修道院调来一个叫尼康的修士辅祭负责管理印字房。1911年,印字房又建立了石印车间。为了提高印刷效率,尼康于1913年前往圣彼得堡参观俄国的一些先进印刷厂,学习铸字技术,返回北京后建立了铸字车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为大量出版经书提供了可能。

1902年英诺肯提乙组建了专门的翻译委员会,除俄国神父以外,还包括6名中国教士和两个抄写工。成立6年里就翻译和印刷了20多种汉语译作。英诺肯提乙在1911年完成了俄国传教士团第三个《新约》版本的翻译,完全采用白话,尽量贴近口语,后来成为俄国传教士团使用的主要版本。他编写《祈祷经文》,翻译《东教宗圣人行实》、《东教宗史记》,主持重刊了《圣教会要课》、《圣史记署》和《时课经》等。中国东正教徒些儿吉乙长^②成了英诺肯提乙的得力助手。些儿吉乙长自小在传教士团的教会学校读书,精通俄语,不仅帮助校对俄国传教士译稿,而且于1912年刊印了自己翻译的《普罗帖斯唐特^③历史》、《西教纪略》、《东正教鉴》、《东西教会纪略》和《圣号解义》。此外,中国籍教徒范中编著了《天主圣教小引》,伊望·包1912年翻译刊印《信经问答》。这说明,这一时期已有更多的中国籍神职人员独立承担了翻译工作。在1916年传教士团为纪念来华二百周年出版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简史》后面附录了

^①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1-е изд. Пекин. Тип. Успен. монастыря. 1916. С.185.

^② 此处依据传教士团出版物——主教英诺肯提乙编辑,些儿吉乙长译:《东正教鉴》,壬子秋季北京东正教会印。俄国学者认为些儿吉乙长是第一个中国籍神父蜜特罗芳之子。

^③ 些儿吉乙长将“新教徒(Протестант)”直接音译为“普罗帖斯唐特”——笔者注。

当时传教士团印字房刊印的神学书籍，照录如下：

北京东正教堂印字房铅印

官话

《事奉经》、《主日八调》、《四部福音》、《宗徒行寔》、《宗徒公书》、《信经问答》、《注解玛特斐乙》、《日诵经文》、《祈祷经文》、《注解创世纪》、《圣教会要课》、《晚堂经本》、《晚堂大课》、《晚堂小课》、《时课经》、《圣咏经》、《启蒙问答》、《旧约简要》、《圣母圣诞赞词》、《举荣圣架赞词》、《圣母进堂赞词》、《主降生赞词》、《主领洗赞词》、《主进堂赞词》、《圣母领报赞词》、《圣枝主日赞词》、《主升天赞词》、《圣三主日赞词》、《主易圣容赞词》、《圣母安息赞词》、《主复活赞词》、《旧约提要》。

文话

《圣经析义》、《宗徒经》、《祝文册》、《圣咏经》、《祈祷经文》、《正教本分》、《日诵经文》、《教会九戒》、《实迹圣传》、《天道指南》、《圣教会要课》、《圣史记畧》、《时课经》、《主日赞词》、《教理问答》、《圣堂仪物名义志》、《教规畧述》、《早晚经本》。

石印

文话

《圣教六戒》、《创世纪》、《主复活赞词》、《注解圣咏经》、《圣咏经》、《讲信经》、《主日八调》、《圣人行寔》、《玛特斐乙福音经》、《属福音经赞词》、《圣堂仪物名义志》、《十二庆贺日赞词》、《教会实言》、《东正教鉴》、《教会史记》、《东教宗史记》、《出耶吉撒特记》、《民数记》、《申命记》、《圣按托尼行实》、《尼适来行实》、《劝义篇》、《东正教道理前引》、《主受难福音经》、《宗徒行实摘要》、《主复活道理》、《主进堂道理》、《出地堂道理》、《圣枝主日道理》、《圣母领报道理》、《音乐点子读本》、《代亡人祈》、《正教畧》、《道学简畧》、《教理问答》、《圣教理问答》、《新约圣经》、《诵经节目》、《神功四要》、《列韦纪》。

北京东正教堂印字房在出版汉语神学书籍的同时，也为俄国侨民出版俄文经书，如《耶稣基督山顶传道》、《圣经》、《注解新约》（内容包括《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约安福音注解》、《俄音标注汉语教堂赞美诗》、《简明祝文读解》以及《俄汉对照教理问答提要》等。

综上所述，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质，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东正教经书翻译与刊印活动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其经历的三个阶段中在翻译内容、规模、专有名词和概念翻译风格、译介人员构成、印刷方法上均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汉译经籍进行文本分析并非本文主旨。

（责任编辑 辛岩）